

「改革元老」高尚全：

坚持市场化 保民企权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曾参与中共历史上三份重要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长期为中国改革献计献策。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位年近九旬的改革元老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表示，“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开放40年的价值取向和核心经验就在于，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人民福祉为目标，坚守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法治理念。他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事业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推进改革。”

■ 香港文汇报
记者 海岩、杨帆 北京报道



■ 高尚全长期为中国改革献计献策。
受访者供图

从年初“消灭私有制”，到近期“私营经济离场”、“第二次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针对民营经济的奇谈怪论不时发酵，引发中国改革何处去的舆论热议。高尚全就此指出，“消灭私有制，在中国和苏联都实践过，都以失败而告终，难道还要以惨重的代价再搞一次吗？”

巩固公有经济 支持非公经济

他表示，“我不赞成私有化，但调整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国有资产从固化的实物形态转化为流动的资本形态，不是私有化，而是在流动中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中央反复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高尚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经验。

高尚全说，改革40年，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证明，这40年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调整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才有了今日丰富的物质基础。整体上，国有企业当前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和税收，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连慈善捐助也是主力军。

各类主体平等 优化市场环境

因此，高尚全强调，改革40年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如果不能使不同产权主体之间保持平等地位，那就重则会发生强取豪夺，轻则打击生产和交易积极性，都将造成生产的破坏，交易关系难以持续。”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但高尚全指出，从现实情况来看，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企业之间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利还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难以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

高尚全指出，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中央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实现政企分开 突破财税改革

长期为中国改革献计献策的高尚全表示，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改革事业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推进改革。

反对行政垄断 提高国企效率

高尚全指出，首先应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有所突破，要从降低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和制度成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如果反对行政垄断，提高提供能源、交通、通讯服务的国企效率，降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品和服务价格，整个经济体的成本就会降低，中国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经济发展后劲就更足。但如果不顾市场和法治，以行政手段去强化提高这些国企的盈利水平，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做大做强，但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高尚全还建议，国有企业要在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从企业法调节向公司法调



重要改革文件 参与三份起草

高尚全，生于1929年9月，上海嘉定人，汉族。教授，高级研究员。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小组副组长，参与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策报告的起草工作。

■ 高尚全强调“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图为民营汽车企业吉利生产线。”
资料图片

贯彻依法治国 扫除发展障碍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高尚全表示，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人民生活也从贫穷落后走向小康。但如今，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中国正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需求结构明显变化，新需求与旧体制的矛盾日益凸显，影响改革深化。

行政缺位错位 阻滞市场经济

高尚全指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十八届四中全会更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将这一理念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最高层次，但依法治国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有待落实。

“行政部门职能错位、越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

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

高尚全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畅通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

公共产品短缺 供需矛盾凸显

针对“三去一降一补”在实际操作中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倾向，高尚全认为，市场化改革仍不到位，比如“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但

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这样做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健康。”

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也是新需求与旧体制矛盾凸显的重要表现。高尚全指出，当前中国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相应社会体制改革却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阻碍扩大内需，目前中国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亦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民众税负水平却不低。

高尚全认为，与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社会福利支出方面，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互联网反垄断 力保知识产权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在高尚全看来，这对政府提出新的改革要求。

高尚全指出，受限于科技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国内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但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给当下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包括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装、小商品市场和门店的衰落；互联网金融的勃发和动荡，及第三方支付带来所谓“无现金



■ 高尚全呼吁加强专利和非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图为内地机器人产品。
新华社

社会”的兴起；互联网社交带来的信息流转加速度等。

适度监管业界 有效去弊兴利

高尚全认为，互联网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有些监管仍是必要的，如第三方支付、规范第三方支付等，尤其是对第三方支付支付的规范，涉及公民隐私、数据寡头垄断等，可能对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必须用有效措施去弊兴利。但也有些规则本应淘汰或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合时宜。对互联网新业态的适度监管程度的拿捏，是今后一个时期政府管理部门面临的重要考验。

“互联网时代一个副作用是，垄断变得易如反掌，互联网产业往往号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的生存空间；互联网的跨界渗透能力使得垄断涵盖诸多领域；互联网时代也是智能制造的时代，各种创新层出不穷，经济持续发展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创新创意，要保护人们创新创意的积极性，就必须加强专利和非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防止垄断对创新的伤害。”高尚全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要特别注重加强反垄断的力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各类创新创意的保护。

「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特写

“这一辈子尽管工作岗位几经变化，却只做了一件事：改革。”被人们称为“改革元老”的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现在虽然年近九旬，依然在为改革鼓与呼。

过去四十年，中央每十年推出一大综合改革：1984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高尚全参加了这三份重要文件的起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已经退休的高尚全则两次向中央提交改革意见并被采纳。

高尚全回忆说，他在2013年5月份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当年7月再提交报告建议，发挥智库的作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改革献计献策。这些建议最终都体现在随后出台的全会决议中。

“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嘛？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高尚全说。